南宋宰相赵鼎怀归诗的内蕴

陈　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在时局动荡的南宋初年,赵鼎的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与之相伴的诗歌作品中充满了怀归之思,但内中包蕴的情感并非平和宁静,却是愤懑不平的。其内质与一般文人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咏归叹穷迥然不同,而是与南宋初年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关涉密切。只有以特定的政治大事件为依据,将其诗文作品结合起来,才能对赵鼎的怀归诗作出客观的解读。

关键词:南宋;赵鼎;怀归诗;内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1-0129-07

南宋初期国势艰危,政局不稳。绍兴和议之前,内有盗寇、兵乱的困扰,外有金人和伪齐政权的南侵破坏,内忧外患可谓深重。面对重重危机,朝廷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断调整,与之相伴随的便是宰相的频繁更替,这又直接导致了朝廷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赵鼎的政治生涯正值此时,他两度出任宰相,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与其他的当权者一样,他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宦海生涯,饱尝郁愤难平的政治情感,当他把这种情感带到诗歌写作中时,其作品便呈现出特别的色调。从赵鼎的《忠正德文集》来看,其诗歌一般侧重于抒发源自于生活事件的各种情感;其文章则大多涉及到朝廷政治、军事、外交等大事件,重在分析特定时期的朝廷政局、探讨国家的有关政策策略,体现出政治家独到的眼光和思考,其政治性、现实性极强。赵鼎的诗文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其诗歌中的情感总是以特定的政治事件为背景和对象,并体现在其文章中。所以,要研究赵鼎的诗歌,就需将赵鼎的各类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考察,才能获得全面、客观、深入的认识。

详考《忠正德文集》就会发现,赵鼎的诗歌中涌动着强烈的怀归情绪。终其一生,这种吟唱不绝如缕,如"求田亦本谋,他日当能办。伏枥马告劳,投林鸟知倦"[1]卷五,694;"功名富贵非吾事,只有渊明会此心"[1]卷六,722;"向来轩冕非吾意,何处园林托此身"[1]卷五,711等等。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重臣,一个聚集了众多政治盟友、曾经左右国家时局的实权政治家,赵鼎为什么会屡屡吟唱归去?其归去的吟唱为什么不是平和淡然的,却蕴含着强烈的愤懑?在这种吟唱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事实?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将以特定的政治大事件和赵鼎的诗文作品为依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我生多难伤睽离,茫然却顾当何归"

重和元年,34 岁的赵鼎写下了《阅陶集偶有所感》一诗,表达了他对于出仕与归隐,或曰对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见解与期许:

> 彭泽县令八十日,束带耻为升斗污。二十四考中书令,端委庙堂挥不去。两公于此固无心,钟鼎山林随所寓。慎勿蹉跎两失之,岁晚要寻栖息处。[1]卷五,701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而归园田居,尽情享受"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2]161,162的随心任性的自在

收稿日期:2012-07-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南宋绍兴和议前的朝臣诗文与政局之关系"(项目编号:12YJA75100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10YBRW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忻(1963—),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之境,成为无数文人追慕的对象;郭子仪位高权重,其治国之才为天下景仰,"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3]《郭子仪传》,3467。在赵鼎看来,这两类出处相反的人生指向本是"固无心"的,故其最高境界也无需刻意追求,二者本无此厚彼薄之分,关键是要"随所寓"。

"随所寓"是赵鼎一贯的思想,因为他深信"斥鷃鲲鹏俱定分,行藏何用倚栏干"[1]卷六,716,"介不为高通不偷,亦知出处非人谋"[1]卷五,699。也正是因为"随所寓"、"非人谋"的思想,所以赵鼎一生并未沉溺于仕与隐的某一端,但从赵鼎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希望"慎勿蹉跎两失之",可结果却恰恰相反,最终他是钟鼎山林俱失之。现实与理想的严重错位,政治失意与欲归不得的彷徨无奈,激起了赵鼎悲恨愤懑之情,使其归去的吟唱充满不平之气。

学而优则仕,跻身朝廷,施展抱负,本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赵鼎也不例外。崇宁五年,赵鼎登进士第后,曾作《登第示同年》云:"氤氲和气凤城春,正是英豪得志辰";"古来将相皆由此,今见史书不误人"[1]卷五,705。他以"男儿要自勉功名"[1]卷六,715激励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但是,靖康之难的发生改变了宋政权的运行轨迹,也把赵鼎推上了错综纷繁的政治舞台,并改变了他的"钟鼎山林随所寓"的初衷。

靖康二年二月,"金人议立张邦昌,鼎与胡寅、张浚逃太学中,不书议状"[4]《赵鼎传》,11285。三月初七日,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四月,赵鼎被伪楚任官,这也成为日后政敌攻击的重要把柄。对此,赵鼎曾在《辩诬笔录》中专章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情状:

> 后数日,余得行首司帖子,请召议事。至崇政殿门外阁子中,见王时雍、吕好问、冯澥同坐。时雍顾谓余曰:"烦公以畿内之事。"出除目一纸示余,除直秘阁、京畿提刑、兼权转运副使。余起立白时雍,以私计不便,不愿就此。时雍作色曰:"今日之事,须大家担负。"余曰:"府官冗贱,何预国论?"时雍怒甚,不复言。舜徒恐激作祸生,谓时雍曰:"且只以府曹兼权。"又谓余曰:"府界职事,府曹兼领何害?兼有正月初成命。"余曰:"若于差权札子内备坐正月初指挥,乃敢就职。"时雍益怒,面色变青,徐取笔勾去"直秘阁"字……次日降太后圣旨差权,余然后方敢举职。[1]卷九,756-757

这时的赵鼎根本没有"钟鼎山林随所寓"的自在,他身不由己地被时势推入政治激流中。他当然深知任职伪楚之非义及其结果,其前"逃太学中,不书议状"的行为已能说明问题。从其《辩诬笔录》的记载来看,其先"以私计不便,不愿就此",后又特别强调"若于差权札子内备坐,正月初指挥,乃敢就职",说明其任职乃是出于被动的、有前提条件的。而且直到四月四日张邦昌尊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初十日张邦昌避位、十一日太后垂帘听政的次日,赵鼎"方敢举职",说明赵鼎确实也是在朝廷的大变故中尽力持身稳妥,避免"蹉跎"而"失之"的。

此事的不得已对赵鼎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济时与怀归的内心矛盾日益加深。宋高宗赵构于靖康二年五月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赵鼎于该年六月即已求罢,其《辩诬笔录》云:"至六月初,余申都省,以京畿措置就绪,远迩宁静,劳来安集,恐非时暂兼权者能办,乞早差正官前来交割。凡累申不报。方朝廷节次行遣围城诸人,议论汹汹之时,余敢露章求罢,而朝廷不听其去。自以权摄始末可考,朝廷亦知之,而不以为事也。"[5]卷九,758一方面,赵鼎"自以权摄始末可考,朝廷亦知之,而不以为事也",继续其济时的志向。据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记载,这一时期张浚、赵鼎、胡寅、宋齐愈交往密切:"公(张浚)在京师,独与开封府判官赵鼎、虞部郎中宋齐愈、校书郎胡寅为至交,寝食行止未尝相舍,所讲论皆前辈问学之方与所以济时之策。"[5]卷九十五上,4355另一方面,他就职伪廷的阴影难以消逝,正如《泊白鹭洲时辛道宗兵溃犯金陵境上金陵守不得入》所云"时时心折梦围城"[1]卷六,724。作于建炎元年六月的《次韵退翁游北山之什》,于寻访名迹之际,已有倦怠怀归之情:

> 徒惊朝市屡更变,遑问邱垅多英雄。鼎湖龙去自不返,非烟长锁琉璃宫……我生多难伤暌离,茫然却顾当何归。伏辕不作马思奋,塌翼应怜鸟倦飞。[1]卷五,700

赵鼎游北山之际所惊叹的朝市更改、人事变迁,何尝又不含有金人南侵、二帝北狩、山河破碎、英雄无奈之痛?"处处悲风吹战角","更作江湖盗贼惊"[1]卷六,724,"满眼豺狼兵火余,我今那暇哭穷途"[1]卷六,720,既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赵鼎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

建炎元年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阳、汜水,诏择日巡幸淮甸……丁酉,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已酉,以谍报金人欲犯江、浙,诏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戊午,太后至扬州"[4]卷二十四,449。当赵鼎随南宋朝廷一路南避金兵之际,其功名之心也随着飘零之感的日渐强烈而开始衰减,他对"兵火向来吾道穷"的感受更加真切说。

飘零泽国几春风，又触惊涛泛短篷。四海未知栖息地，百年半在别离中。功名元与世缘薄，兵火向来吾道穷。独倚危楼凄望眼，青山无数浙江东。（《趋三衢别故人时车驾幸杭州》）[6]18430

这一时期赵鼎的诗歌中大量出现欲归不得、欲进无门的悲情：

契阔死生俱泪下，功名富贵此心休。杀鸡为黍思前约，问舍求田愧本谋。又向春风话离别，此生生计日悠悠。（《别张德远诗》）[1]卷五，708

酬恩未拟填沟壑，强颜忍复陪簪裾。……田园坟垅乱戎马，是身是处长羁孤。……只今云台罗俊彦，鄙贱老丑憎朴疏。跃马食肉付公等，浮家泛宅真吾徒。（《舟中呈耿元直》）[1]卷五，701

陶令早知今日是，庾郎能赋此生愁。残年流荡归无处，兰芷潇潇江上秋。（《将发泗上》）[1]卷五，708

折腰为米岂所愿，卖剑买牛端可贤。韩公雅欲却穷鬼，赵壹其如无一钱。罢官清坐乃吾分，号寒啼饥谁汝怜。政缘兹事藉升斗，使我不得休林泉……汗衣尘帽门户底，包羞忍耻王公前。（《戊申正月行在参吏部示诸幼》）[1]卷五，700

当“田园坟垅乱戎马，是身是处长羁孤”之际，酬恩之心、屈辱之感、亲朋之别、流荡之悲交织于心，为官则“强颜忍复陪簪裾”，“鄙贱老丑憎朴疏”，“汗衣尘帽门户底，包羞忍耻王公前”；归去却又“酬恩未拟填沟壑”，“号寒啼饥谁汝怜。政缘兹事藉升斗，使我不得休林泉”。济时与怀归的矛盾反复在心中激荡，赵鼎无可如何，只能慨叹“此生已复外升沉，出处由来著意深”[1]卷五，710，“功名富贵此心休”，“此生生计日悠悠”，“我生多难伤暌离，茫然却顾当何归”……这样的迷惘无奈正是乱世流荡中赵鼎心境的真实再现。

二　“虽安吴越胜，讵忘河洛尊”

建炎三年三月发生了逼迫高宗逊位的“明受之祸”：“扈从统制苗傅忿王渊骤得君，刘正彦怨招降剧盗而赏薄。帝在扬州，阉宦用事恣横，诸将多疾之。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傅等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已丑，改元明受”；癸卯，“吕颐浩、张浚传檄中外讨傅、正彦”；“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庚戌，复纪年建炎”[4]卷二十五，462。据《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笔录》所载赵鼎此时的行踪云：建炎三年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杀签书枢密院王渊，诛宦者，遂成明受之祸。是日，某至衢，泊舟门外浮石渡”[1]卷七，730－731；四月“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勋员外郎”[1]卷七，731；五月“初三日，车驾至镇江。某始供职”[1]卷七，731。在这场政治大动荡之后，赵鼎逐渐走上了南宋的政治前台，开始了参与朝廷事务的生涯。《宋史·赵鼎传》记载高宗对赵鼎的评价云：“鼎在言路极举职，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肃宗兴灵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无愧昔人矣”[4]《赵鼎传》，11286。在全身心投入朝廷政治的这一期间，赵鼎的诗歌创作量大大减少，进与退的矛盾心情也极少出现，直到建炎四年十一月罢官。

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甲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鼎罢。初，上欲除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为节度使。鼎以企宗非有军功，持不下，上不乐。诏鼎累乞宫祠，可本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免谢辞”[7]第1册，563。赵鼎由此开始了大约两年的寓居衢州常山县黄冈山的赋闲生活。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诗歌，有关进与退的思考又重新出现在笔端：

朝市邱园定孰优，要将闲适换深忧。（《雪中与洙辈饮》）[1]卷五，713

悠悠事与本谋异，扰扰人谁此意同。（《雪晴东轩独坐》）[1]卷五，713

孤怀岂胜百忧侵，息影由来贵处阴。志谢长嘶走千里，身如倦翼返深林。（《和元长书怀二首》）[1]卷五，711

表面上看，这时的赵鼎已经换上了“要将闲适换深忧”的心境，他确实也写下了《山居次韵止老》“衣巾翠湿阴阴竹，屐齿寒生步步云。莫向清流还洗耳，世间言语不曾闻”[1]卷六，714这类超越凡俗、摆脱纷扰的诗歌。但是，考虑到赵鼎此前在朝廷上从政的艰难，全面审视赵鼎此期的境遇及作品，就会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据《宋史·赵鼎传》记载：“韩世忠败金人于黄天荡，宰相吕颐浩请上幸浙西，下诏亲征，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言：‘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坚卧不出，疏颐浩过失凡千言。上罢颐浩。诏鼎复为中丞……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张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阳遂陷……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会辛企宗除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寻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4]《赵鼎传》，11287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宰相“恶其异己”，“上不乐”其“忤旨”，大将拒听其奏，赵鼎的政路亦可谓艰难。正因为如此，他解职后寓居常山县黄冈山的赋闲生活不可能是真正的内心宁静。此期诗歌在“心远身闲”、“潇然”“无事”的洒脱字面背后，涌动着赵鼎对自己无端“招谤”、“满耳是非语”的抑愤悲恨，其中蕴含着的愤懑随处可见：

心远由来绝世纷，更寻邱壑避嚣尘。门阑已觉

贫无事,宾客应怜老畏人。诗不名家免招谤,酒虽作病要全身。(《六月十三日书呈元长》)[1]卷五,709

心远身闲眼界清,潇然回首万缘轻。更将满耳是非语,换作松风溪水声。(《山中书事》)[1]卷六,714

微词动招谤,烂醉可藏身。(《次韵富季申寄示》)[1]卷五,704

功名常若归难必,拙直悬知退有余。避谤杜门宾客绝,病痰妨饮酒杯疏。(《示陆昭中》)[1]卷五,709

随分谋生何厌拙,莫因饮啄傍人飞。(《有送生鸠者放之使去》)[1]卷六,715

诗歌里一再出现的"招谤"、"避谤"、"是非语"所昭示的居官朝廷的愤懑难安,以及"拙直悬知退有余"、"随分谋生何厌拙"的自我表白,都含有作者的抑郁不平。赵鼎在《九日晚坐独酌一杯》中说自己要"拟借灵均兰作佩,尚余陶令菊堪餐"[1]卷五,713,其实也就是要把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带到归居中去,他要守定"拙直",要"随分谋生何厌拙"。这样的心境并不是真正的"心远由来绝世纷"、"潇然回首万缘轻"的隐者所具有的。赵鼎说自己是"更寻邱壑避嚣尘"、"避谤杜门宾客绝",这里的"避"才应当是他此时的真实心境。"避"的内涵在于守拙,即《彦文携玉友见过出示致道小诗因次其韵》所谓"于世无功懒据鞍,诛茅种竹老空山。不应天与静中趣,自是人容拙者闲"[1]卷六,722。赵鼎寓居常山县黄冈山期间的赋闲,更多的是"拙者闲",他自称"拙者",其对立面自然是"巧"和"圆"。赵鼎既然是"微词动招谤"、"拙直悬知退有余",则其所谓"闲"的内蕴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刚直和郁愤的成分,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彻底的"静中趣"了。

寓居常山县黄冈山期间,赵鼎修建了独往亭,引来了不少题诗,这些题诗大都是期望赵鼎"出佐明天子","毕辅中兴业"的。其中吕本中、林季仲、张嵲的题诗的指向尤为清晰:

谢公为时出,四海正仰渠。雅志在东山,本末固不渝。苻坚百万师,一扫谈笑余。今公抱长策,岂止安石徒。平生独往愿,结亭山一隅。跻扳上修竹,已自胜巾车。举手谢世人,不与汝同途。出佐明天子,意欲无强胡。行当复中原,即日还旧都。岂容思昔隐,更作深山居。小人病无能,误入承明庐。朝夕投劾归,为公先扫除。(吕本中《题官使赵枢密独往亭》)[6]18234

海内英豪还有谁,宁容丘壑著皋夔。欲知今日中兴业,已定黄冈独往时。谢傅本无朱组愿,留侯应念赤松期。更须整顿乾坤了,我亦芒鞋随所之。(林季仲《寄题赵丞相独往亭诗》)[6]19964

留侯佐汉日,结志已离群。唐乐闲退年,陟险勤邦君。区中岂所慕,物外良作论。……虽安吴越胜,讵忘河洛尊。毕辅中兴业,终回西北辕。扈跸归庙社,角巾反丘樊。(张嵲《寄题赵丞相独往亭》)[6]20464

吕本中与赵鼎关系密切,《宋史·吕本中传》云:"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会《哲宗实录》成,鼎迁仆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桧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风旨,伺和议不成,为脱身之计。'风御史萧振劾罢之,提举太平观,卒。"[4]《吕本中传》,11637林季仲也是经由赵鼎推荐。据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笔录》云,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初至温,对江心寺,即荐温人吴表臣、林季仲以补察官之阙"[1]卷七,737。又《宋史·赵鼎传》载:"鼎尝荐胡寅、魏矼、晏敦复、潘良贵、吕本中、张致远等数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贤长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之徒,陛下能去之乎?'"[4]《赵鼎传》,11293-11294吕、林二人既与赵鼎同进退,他们于赵鼎退罢之际,作诗激励亦在情理之中。至于张嵲,《宋史·张嵲传》虽未记载张嵲与赵鼎之间直接的政治上的关联,但他"所上奏议,如论和战守、论攻取等篇,史皆采入本传。于当时事势尤条析详明。惟绍兴复古诗一章贡谀秦桧,深玷生平","今其代桧奏稿虽已不存,而是诗尚传留,供千秋之嗤点,亦足以昭炯戒矣"[8]《紫微集》提要,1350。张嵲阿谀秦桧之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本朝五·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考之甚详,兹不赘述。此事发生在绍兴十年金人渝盟之后,而赵鼎寓居常山县黄冈山则早在建炎四年十一月至绍兴二年十月间。所以这里的《寄题赵丞相独往亭》与他后来的被"千秋之嗤点"无涉。结合《宋史·张嵲传》所载事迹及其作品来看,张嵲对国势的分析及见解与赵鼎等人大抵一致。至少当赵鼎此期赋闲之时,张嵲与赵鼎、吕本中、林季仲的思想并不相左,所以此期吕本中、林季仲与张嵲围绕独往亭所作诗歌中流露出的政治情感应该是一致的,这种情感也是与赵鼎此时的内心思想同向的,因此诗中出现的期望亦非毫无依据地虚言阿谀。

再从赵鼎这一面看,自明受之变后供职,他积极参与朝政,可谓恪尽职守:"时上每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为台谏,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行之。"[7]第1册,403汪藻有《左司谏赵鼎殿中侍御史制》,称赞赵鼎"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誉四闻"[9]第156册,317。李正民《赵鼎侍御史制》则云:"尔材猷敏

达，议论坚明。尝赋命于使华，旋记功于选部。顷由谏省，执法殿中，不为义疚而利回，岂以刚吐而柔茹？抨弹既允，裨益居多。其升横榻之严，进贰中司之峻。惟尔之任职者，见于已试；而朕之用尔者，盖以叙迁。益奋厥忠，奚俟多训。”[9]第163册，17 又《赵鼎除御史中丞制》亦称其“操行直方，志气刚大。既洁身而无党，每论事而不回。自总杂端，风节甚峻。属中司之虚位，顾横榻之久专。宜进长于南台，俾澄肃于在列”[9]第163册，18。在南宋朝廷最艰难的南奔之际，赵鼎始终追随高宗左右。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驾至钱清。闻金人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驾回避敌”[7]第1册，445。这时，朝廷的情形万分危急：“己巳，上发越州，次钱清堰，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上谓辅臣曰：‘充守江不利，陈淬战没，王璺拥兵南遁，金国人马必临浙江追袭，事迫矣。’”高宗决定用吕颐浩之策，“乘海舟以避敌”，“颐浩奏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上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侍御史赵鼎试御史中丞，二人皆尝建议避敌，故遂用之”[7]第1册，444－445。“庚寅，从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郑望之以疾辞，不至。给事中兼权直学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舶，请陆行以从，许之。于是，扈从泛海者宰执外惟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权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綦崇礼、太常少卿陈戩六人……时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风涛之患，皆面无人色”[7]第1册，453。赵鼎在万分艰危的情况下，及时建议国策，他上《论敌退事宜》，是因为“时或传金人在建康筑城为度夏计，故鼎有是言”[7]第1册，464。建炎四年“三月，车驾在温州。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车驾进发，某力言其未可”[1]卷七，737，他为此上《论回跸》；建炎四年夏四月“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赵鼎上《论西幸事宜状》[7]第1册，483；建炎四年夏四月“甲申，乃下诏亲征。中丞赵鼎以为平江残破，最酷人心，不乐是行”[10]卷八，94，遂上《论亲征》。

一方面，如赵鼎自己所言，“臣本由拙直受知于陛下，亦以招怨于人”[7]第1册，832，其个性使他在朝廷上难于左右逢源；但另一方面，处在艰难动荡的时世中，赵鼎的经历、能力、作为决定了他不可能为朝廷轻易抛弃，此次他的罢官归去，虽有“忤旨”的成分，但并非水火不容。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了解他的朋友，吕本中、林季仲、张嵲在诗歌中径直把赵鼎比作谢安：“今公抱长策，岂止安石徒”；“谢公为时出，四海正仰渠。雅志在东山，本末固不渝”。既然为时而出与雅志东山本非绝对对立，何况“海内英豪还有谁，宁容丘壑著皋夔。欲知今日中兴业，已定黄冈独往时”，所以吕本中认为赵鼎应当要“出佐明天子，意欲雄万夫。行当复中原，即日还旧都。岂容思昔隐，更作深山居”；林季仲盼望赵鼎“更须整顿乾坤了”；张嵲则提出了进退两不相妨的见解：“毕辅中兴业，终回西北辕”。这些诗句与其说是对赵鼎的期许，不如说是给赵鼎的定位。假如赵鼎没有投身政治的能力或作为，假如他已经彻底抛开了功业之心，完全沉浸到归去的独乐之中，这些诗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基，吕、林、张当然也就不会借赵鼎修建独往亭而兴发这样的议论了。

从其后赵鼎复起，高宗对赵鼎的态度亦可见出这一点。绍兴二年十月，赵鼎“除知平江。时吕颐浩再相，两辞不获。道改知建康，充江东安抚大使”[1]卷七，739。沈与求有《赐新知平江府赵鼎辞免不允诏》一文云：

> 卿节概刚方，器量闳达。临事绝回邪之见，为政多恺弟之称。自初进阶，皆朕识擢。寘之言路，论尤切于爱民；付以事枢，志每先于许国。退即祠官之逸，荐更岁籥之赊。执德不回，宅心无竞。是用起从闲适，纾朕顾忧。[9]第176册，212

这里对赵鼎“论尤切于爱民”，“志每先于许国”的品格加以赞赏，又特别指出“自初进阶，皆朕识擢”，“起从闲适，纾朕顾忧”，可见高宗此时对赵鼎是信任的。《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笔录》亦记载赵鼎的再起云：（绍兴二年）“十一月，过行阙。初对，上玉色怡然，顾劳甚至……上曰：‘江东阙帅，朕晓夕思之，无以过卿者，实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陈事，朕当自主之。’余顿首谢”[1]卷七，739。高宗的信任，既可作为赵鼎归居时期仍然心怀大志的注脚，也可作为他日后出任宰相时有所作为的前提。

三　“向来轩冕非吾意，何处园林托此身”

绍兴四年三月八日，赵鼎拜参知政事。九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他力促高宗亲征，挫败南侵的金与伪齐联军。“时刘豫子麟与金人合兵大入，举朝震恐。鼎论战御之计，诸将各异议。”“方警报交驰，刘光世遣人讽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世忠亦谓人曰：‘赵丞相真敢为者。’鼎闻之，恐上意中变，乘间言：‘陛下养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金人遁去，上谓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上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4]《赵鼎传》，11288－11289 高宗此时对赵鼎的倚重和信赖程度极高。

赵鼎拜相以来积极投身朝政，直到绍兴六年十二月，“赵鼎既与浚不咸，左司谏陈公辅因奏劾鼎”[7]第2册，464。赵鼎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绍兴七年九月淮西兵变后，赵鼎再相。绍兴八年十月，再次罢相。《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八十四，绍兴八年十月

条对秦桧得志、赵鼎罢相一事记载甚详:

> 金人有许和之议。上与宰相议之。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一日朝殿,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讲和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桧曰:"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上曰:"朕独与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鼎之议不协,遂罢宰相,出知绍兴府。首途之日,桧乞奏备礼饯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别筵,率执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罢,即登舟。桧曰:"已得旨饯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议论已不协,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师离岸。桧亦叱从人收筵会而归。且顾鼎言曰:"桧是好意。"舟已开矣,自是桧有憾鼎之意。[11]1333

高宗既与秦桧达成一致,与金议和之心"坚确不移",且"不许群臣干与",赵鼎的罢相便成为必然。虽然高宗也称赞"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4]《赵鼎传》,11293。但秦桧的"憾鼎之意"却很快具体化为对赵鼎"罪恶滔天,不可殚纪"[7]第2册,730的声讨和毫不留情地斥逐。《宋史·赵鼎传》载:"桧恶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讽谢祖信论鼎尝受张邦昌伪命,遂夺节。御史中丞王次翁论鼎治郡废弛,命提举洞霄宫。鼎自泉州归,复上书言时政,桧忌其复用,讽次翁又论其尝受伪命,乾没都督府钱十七万缗,谪官居兴化军。论者犹不已,移漳州,又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4]《赵鼎传》,11294在秦桧把持朝政,必欲置赵鼎于死地的大前提下,赵鼎对自己"初心耿耿,誓许国以忘身;末路区区,欲庇民而尊主"[1]卷四,690的本心进行自省,当他回顾自己"叨尘既久,违缪滋多。自信直前,执迷不反"[1]卷四,691的仕进历程时,他的愤懑委屈也是溢于言表的。加之远谪直接导致其痛失二子,他所受到的打击是致命的。《中兴小纪》卷二十八引《赵鼎事实》曰:

> 时鼎连失洙、渭二子。与亲知书曰:"幼子之病,以某谪温陵,失于医理而死。长子之病,以某谪潮阳,惜于离别而死。一罹被谴,而并杀二子,盖负罪之深,宜诛而贷,故移祸私门,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毙,强颜苟活,惟是责躬,无地自容耳。[10]323

晚年的赵鼎真可谓钟鼎山林两失之,他"丹心未泯"却又白首无归,《谢到吉阳军安置表》云:"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1]卷四,692他对自己一生"自信直前,安处危机之上;执迷不返,卒投罪罟之中"[1]卷四,691的遭遇感慨万千,唯有悲怨悔恨而已。《谢到潮州安置表》云:"臣忧患踵至,羸癃日增。始抱疾以还家,即衔悲而哭子。齿发彫瘁于感伤之后,精神昏耗于驱驰之余","杜门省愆,更觉悔尤之自取。噬脐莫及,流涕何追!"[1]卷四,691在这种心境下,他的归去之作处处充满悲音:

> 尽室嗟何往,穷年浪自悲。才疏身潦倒,地远迹孤危。风雨江南岸,豺狼天一涯。畏途端可悯,薄宦竟奚为。已失田园计,难忘升斗资。毋烦俗子问,有愧达人嗤。病马思春草,惊鸟绕夜枝。登舟一长叹,此意只君知。(《登舟示邢子友》)[1]卷五,704-705

> 流水迢迢长念远,飞花糁糁又伤春。向来轩冕非吾意,何处园林托此身。(《清明诗》)[1]卷五,711

> 何意分南北,无由问死生。永缠风树感,深动渭阳情。两姊各衰白,诸甥未老成。尘烟渺湖海,恻恻寸心惊。(《思乡》)[6]18431

当赵鼎愤而写下"风雨江南岸,豺狼天一涯"的诗句,其怨恨亦深。联系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秦桧必欲置赵鼎于死地的事实:"先是太师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时鼎、光皆在海南,广东经略使王鈇问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曰:'胡铨何故未过海?'铨尝赋词云:'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棣即奏铨'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毁谤当途,语言不逊。公然怨望朝廷'。"[7]第3册,216赵鼎此处的诗句"风雨江南岸,豺狼天一涯",与胡铨"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的内涵其实是同出一辙。当此"尽室嗟何往,穷年浪自悲。才疏身潦倒,地远迹孤危"之际,赵鼎一方面对自己仕路绝境的遭遇怨愤无奈,"畏途端可悯,薄宦竟奚为";另一方面又对田园无归的结局充满憾恨:"已失田园计,难忘升斗资。毋烦俗子问,有愧达人嗤。"正是在这样钟鼎山林俱失的悲情下,他怅恨于"向来轩冕非吾意,何处园林托此身",他对飘零无归的晚景充满悲戚:"尘烟渺湖海,恻恻寸心惊",他最终是在秦桧的步步紧逼下不食而死。

宋人吕中曾对赵鼎的宰相生涯这样评价:

> 自绍兴四年赵鼎为相,伪齐与金分道入犯,鼎决亲征之议。于是,(韩)世忠进屯扬州,流星庚牌之计一行,遂捷于大仪镇,而金、伪俱遁矣。鼎又荐

（张）浚可当大事，以枢府视师江上，将士见浚来，勇气百倍，而军声大作矣。自五年杨么既平，东南无盗区。于是鼎左浚右，并平章事，兼领枢密，俱带都督。浚出视师，以行府为名，而鼎居中总政，表里相应。虽孟庾、沈与求有三省枢密奉行府文书之讥，而鼎至公协心，未尝计较，说一般话，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诸贤聚会，一时号小元祐矣。[7]第2册，451

在时局动荡、风云变幻的南宋初年，赵鼎有过肩负国家重任，决策安邦的功绩，也经历了放逐流徙，最终绝食而亡的晚境。这样一个政治命运跌宕起伏的政治家，其生前留下的诗文作品中的归隐之思充满了愤激之情。其归隐之思的内质与一般文人的咏归叹穷迥然不同。赵鼎曾高居众臣之首，主导朝廷对内对外政策的走向，故一般意义上的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文人悲情较少出现；同时，在南宋初年朝廷不稳、政见多异的背景下，赵鼎的所言所行又牵连到朝廷内部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给他的内心涂上了暗淡的色彩，使他愤懑抑郁。他所肩负的朝廷重任、他所面对的激烈抨击和掣肘，都使他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恬淡。一方面，他在诗文中强烈地向往归隐，特别是被斥逐弹劾时更加如此；另一方面，他所咏唱的归隐始终都在纸上，内中充满了源自于现实政治的浓郁厚重的愤懑之情。

参考文献：

[1]赵鼎. 忠正德文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陶渊明集[M]. 逯钦立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曾抗美，徐德明校点.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0]熊克. 中兴小纪[M]//丛书集成初编. 新1版.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The Connotation of Minister Zhao Ding's Nostalgic Poem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X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al fortune of Zhao Ding was full of ups and down under the turbulent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 poems are filled up with nostalgia, not tranquil but angry. The connotation of his poems, which mainly relates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mmon literati, i. e., the suppression of one's inspirations. Only when the related specific political affairs are reviewed together with his poems can one comes to a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Zhao Ding's nostalgic poems.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o Ding; nostalgic poems;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